

一場從基層而起的運動—— 陽明學講會與小讀書人

■ 張藝曦

本文以江右陽明學派的重鎮安福縣為例，討論明中晚期陽明學的流傳模式。安福是許多陽明學大儒的群聚地，當地極盛的講學活動，則是建立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上，亦即大儒在書院講學，而小讀書人在聽講以後，回到鄉里進行二次傳講。田土丈量等社會事業，同樣也是在兩方的合作模式下而取得成功。過去百年來對陽明學的研究，多聚焦在大儒的學說，以及大儒與下層平民的接觸，卻相對輕忽了小讀書人這一大群人，但其實小讀書人的二次傳講，才是讓江右陽明學派臻於極盛的關鍵所在。另外，我們可根據安福的典型來看其他類型，所以本文進一步比較江右與泰州，以及安福與吉水兩縣陽明學流傳的差異所在。

陽明心學對明中晚期思想、文化及生活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響，不僅在學說上創新，各地講會的舉行，以及如余英時先生所說，陽明心學家有其「覺民行道」的學術實踐，而從事鄉約、田土丈量等事。¹但過往相關研究較多聚焦在大儒的思想內容、學術論辯，以及相關的講會活動，由於是以大儒為中心，在視角上不免有所侷限。陽明學及其講會的盛況，是大儒與小讀書人共同促成的，所以有必要加入小讀書人的角色及視角。（圖1）

所謂小讀書人，是跟大儒相對的一群人。大儒未必都有極高的功名，但他們擁有跨地域的聲望及影響力，相對於此，小讀書人多數是擁有中下級功名的士人，或是布衣、處士，而沒有跨地域的聲望及影響力。大儒與小讀書人，彼此共同形成整體，由於是以學術成就及影響力，而不是用功名劃分彼此，所以不宜用

功名高低來劃分大儒或小讀書人。

陽明心學以浙中、泰州、江右三派最盛，江右陽明學派被視為正統，因此以下便以江右陽明學派的重鎮安福、吉水等地為例來討論。

大儒講學，與小讀書人的二次傳講

過往相關研究會比較注意到大儒講學活動，小讀書人是參與者，這樣的視角固然沒錯，但卻失之簡化。大儒往往會在較容易聚集人群的場所或知名的書院講學（也有例外），如安福復古書院便在縣城，而這不僅是安福最重要的講學地，而且往往可以聚集縣城、各鄉，甚至他縣的人前來聚講。

但若只是大儒在書院講學，人數有限，影響也有限。所以在講學以外，關鍵還在於前來聽講的小讀書人所作的二次傳講。（圖2）小讀書人的二次傳講，不見得跟大儒所講的一

樣，可能有簡化、有小讀書人個人的見解，甚至會扭曲大儒的原意，也因此學術史的討論，由於重視思想的精確及純粹，所以不會注意小讀書人。但我們若是從思想流傳的角度來看，在流傳的過程中，思想本就會有簡化、變形或扭曲，但



圖1 民國 溥心畬 王文成公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寄存 002298



圖2 王守仁與門人弟子講學圖 取自鄒守益編，《王陽明先生圖譜》，收入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·43》，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8，頁35。

若思想的核心沒有被改動，都可視為是思想的流傳。這就像是基督教有許多地方教派，各地教派對聖經的解釋及所持的教義各有不同的變形，所以教廷提出：三位一體、神人二性與十字架救贖等基本原則，只須承認此三者，便不會被視為異端。陽明心學家極重宗旨，儘管脈絡及用意不同於教廷的原則，但其作用是很類似的：也就是無論思想如何流傳，只須仍不離其宗旨，就算是從大儒而來的學說。

小讀書人的二次傳講是讓思想流傳的關鍵所在。陽明心學雖然訴求簡易直接，但這是相對於程朱學而言，畢竟再簡易再直接，對一般庶民百姓而言，仍是隔了一層。大儒所講的內容仍較多傾向原則性的學說或概念，所以前往書院聽講的，以小讀書人居多，有時也會有農工商賈前來聽講，但不會是常態，人數也不會

多。至於小讀書人的二次傳講便很容易直接面對這些庶民百姓，小讀書人會因傳講對象的不同，而對所講內容有所調整，或者使其更生活化，或者以生活周遭的事物舉例。小讀書人對大儒的學說會有所轉化或甚至變形，但正是轉化或變形，讓大儒的學說可以更深入到鄉野閭里之間。

也因此，我們在看陽明學流傳，不能只是看大儒在書院的講學而已，還必須看小讀書人在地方上的講會。這類講會還因區域大小而分，至少分作鄉會與家會。一縣分作數鄉，一鄉又分數個都（或里），一都中有數個家族。所謂的鄉會，名義上是一鄉之中，但多半是聯合數都共同舉行。家會則可能是一都之內的數

個家族共同舉行，也可以在自身的家族內舉行。於是我們至少看到三個層次的講會：大儒在縣級的書院講學，其次是小讀書人舉行的鄉會與家會。

這是比較理想的形式，而有此基本型的概念，便可知各縣的陽明學講會的發展特點或偏重。如安福與吉水兩縣都是陽明學的重鎮，而且只在鄰縣，安福的陽明學講會是很理想形式，即鄒守益（1491-1562）這位大儒主持縣城的復古書院講學，地方上則有鄉會、家會的舉行。（圖3）相對的，吉水陽明學在羅洪先（1504-1564）的主持下，講會不多，由於沒有小讀書人前往各地鄉里作二次傳講，於是陽明學的發展便多侷限在羅洪先所在的鄉里。（圖4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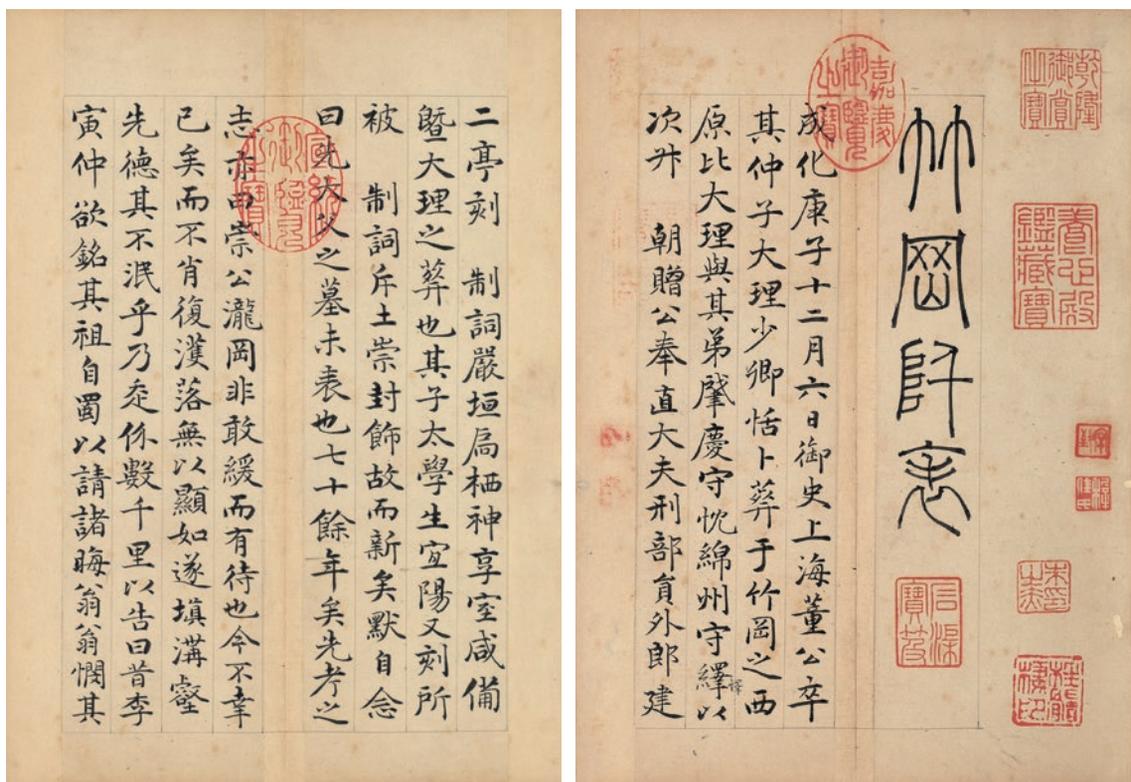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 明 鄒守益撰文，許初書法 竹岡阡表 冊 楷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957
鄒守益之父鄒賢，與董巨陽之父董恬，同為弘治9年（1496）進士，且董巨陽曾師從鄒賢，遂循此情誼而請鄒守益為其祖父董倫作表。



圖 4 吉水縣同水鄉 61 都大儒羅洪先及其門人弟子所在地 向靜攝

這也是我們必須更深入到縣以下的層級看學術發展的原因。從縣到鄉與族，從大儒到小讀書人，正是這些在鄉里間的小讀書人，以及他們所做的二次傳講，形成明中期陽明學的盛況，而且這正是陽明學與兩宋以來理學的差異所在。兩宋以來的理學家便常在書院講學，而知名理學家既有群從弟子，其講學也常可吸引大批的聽眾，但卻少見鄉里間小讀書人的二次傳講。地方上的各式講會，正是讓陽明學與兩宋以來理學的不同處。

幾種小讀書人的個案

以安福為例，便有許多小讀書人在鄉里間舉行講會的事例，這些小讀書人也有區別，有些是比較著名的。如歐陽瑜（1528年舉人），他有舉人功名，但其聲名尚僅侷限在一鄉，而沒有跨地域的聲名，所以可說是介於大儒與小讀書人之間的人物。歐陽瑜跟鄒守益一樣都是北鄉人，加上他隨從於鄒守益講學的腳步，所以他也參加復古書院的講學，而且據說他「詣書院如赴其家」。這也凸顯出他雖然沒有像鄒

守益一樣有跨地域的聲名，但仍然頗受當時人的看重。由於復古書院不常有講會，所以學術流傳的關鍵更多在於家會與鄉會，也因此歐陽瑜每月朔望率子弟會講於家祠，而且立鄉會達到四個之多。²如前述，一鄉的地域範圍不小，而歐陽瑜立四個鄉會，可知他很希望把陽明學真正推行到一般人的生活中。

至於一鄉之間的小讀書人，朱調、朱淑相則是很好的例子，二人原本都有諸生功名，但棄去，二人都師從鄒守益，而在鄉里間講學，頗有聲名，並稱作「南來兩朱」。朱淑相有一間個人書屋，以此書屋為中心舉行講會，據當時人形容說：

先生每朔望為家會，月為族會，季為鄉會，諸所發明，一時在會者聞而興起，兢兢服行其教，無敢失。以故朱氏子弟最以繩檢聞，途遇之，不問可知其人，然皆公倡導維持之力也。³

朱淑相把講會分得更細，分作家會、族會與鄉會，初一十五舉行家會，每月行族會，每季還有鄉會，顯示他花費較多心力在家與族的教化上，而其效益則是讓族中子弟的言行有所改變。

許多小讀書人未必有歐陽瑜的份量，能夠常駐在復古書院講學，也不見得能夠如朱調、朱淑相，成為一鄉之間的知名人物。所以他們無法形成規範一樣定期舉行家、族、鄉會，但仍會不時在鄉里間舉行講會，有些是鄉會，有些是族或家會，這些都被收錄到地方志中，或文集的行狀傳記或墓誌銘也會記載。如王宗舜（嘉靖年間貢士）與鄉里人士舉行惜陰會，這是聯合幾個都里的人士共同舉行的鄉會。如王威建嘉會堂，舉行惜陰會，嘉會堂是個人書屋，而此惜陰會則可能是鄉或族會。⁴

面向地方豪強

劉元卿（1544-1609）所在的安福西鄉，是樸素少文之區，頗多豪強之輩，因此不像安福的其他三鄉有大儒在書屋或書院講學，以及許多小讀書人為其作二次傳講。儘管嘉靖年間（1522-1566）西鄉也有一些小讀書人前往復古書院聽講，但回到鄉里以後，卻少有發揮的機會，必須等到多年後，劉元卿在西鄉倡學，小讀書人才起而響應。在此我們正可看到大儒與小讀書人間互為表裏：一門學術廣泛流傳，不能只有大儒的書院講學，也不能只有小讀書人的傳講，而必須有大儒、有小讀書人，才發揮最大的作用及效益。

劉元卿出身不高，也非名門世族之後，所屬的南溪劉氏是贊雄於鄉里的西鄉大族，因此他必須前往縣城求學，過程中頗受其他名門世族之後的欺凌與羞辱。也因此，劉元卿考取舉人功名以後，生活及心態並未大變，很能夠融入鄉里的生態，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。也是這個緣故，所以嘉靖年間陽明學始終難以傳入的西鄉，卻在隆慶（1567-1572）、萬曆（1573-1620）年間以劉元卿一人之力，加上當地小讀書人的響應，而讓西鄉在一二十年間便建立三間書院，以及取得地方家族的支持或配合。

西鄉小讀書人如王子應，生於正德年間（1506-1521），其族金灘王氏以貲財雄於鄉里，文教非其所長，王子應早年曾習舉業，不久棄去，但他應是該族少數有詩書素養的人。當王守仁（1472-1529）在浙江講學時，王子應動念希望前往聽講，遭其父母與族人反對，於是王子應只好就近前往安福縣城的復古書院，習於鄒守益、劉文敏（1490-1572）等大儒門下。直到三十多年後，劉元卿在西鄉倡學，王子應雖已年老，但終於可以發揮影響力，於是率領及動員族人前往聽講。⁵類似的情形也可見於洋溪趙氏，

如趙師孔、趙子達都曾有諸生功名，趙師孔是鄒守益的門人，趙子達則是西鄉諸生領袖，二人雖欲在鄉里倡學，效果有限。直到劉元卿前來西鄉，才成功作興風氣。⁶

賀宗孔則是連諸生功名也沒有的一介布衣，甚至有可能是地方豪強，所以當劉元卿在西鄉倡學，而他前來聽講時，會中人便刻意通知劉元卿，劉元卿也特別與其單獨談說。劉元卿的講說似乎有一種魅力，讓這些以力為豪強者能夠降心聽講，甚至衷心佩服，在對談過後，賀宗孔表示：「吾幾枉此生矣！」於是一心向學，而且希望以學來化俗。⁷劉元卿的族人劉本振也有類似的反應，劉本振是任俠意氣之人，又好訴訟，且不喜讀書，一聽人談論儒經便會睡著。但他卻願意聽劉元卿講學，而且聽到講聖人可為，便喜動顏色，為自己也可以當聖人而喜不自勝，於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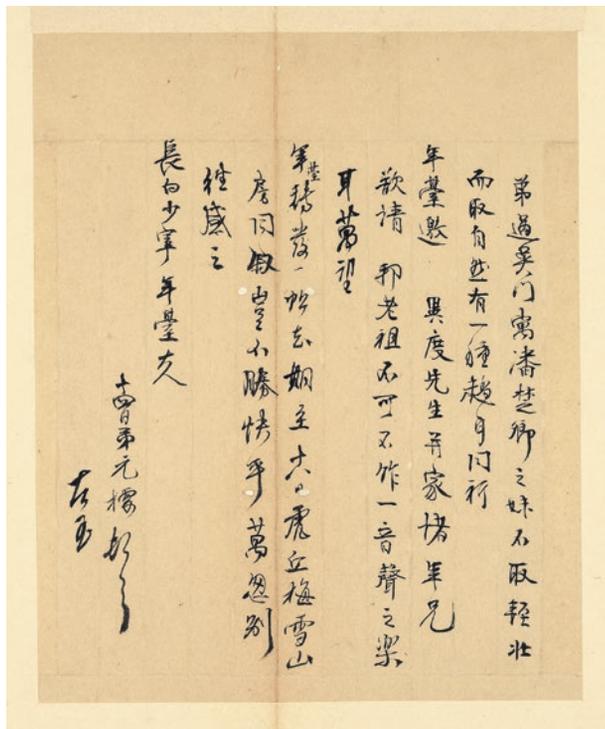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 明 鄒元標 尺牘 收入《明人名牘》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67 鄒元標以諫張居正奪情聞名，也是江右陽明心學的殿軍。

折節力學，而且糾集子弟舉行講會。⁸

劉元卿得到賀宗孔、劉本振等這些有力人士的襄助，於是順利成立復禮書院（隆慶六年，1571），此後又陸續成立識仁書院（萬曆十九年，1591）與中道會館（萬曆三十一年，1603）。值得注意的是賀宗孔的反應，他因亟於移風易俗，於是總不滿意書院講學的成效，多次向劉元卿抱怨書院能夠容納的人數太有限，能夠聽講的人太少，甚至指責劉元卿怠惰，不該只是坐在書院講學，而應該挨家挨戶去講才對。從賀宗孔的這番話，可以想見劉元卿的個人魅力應是極大的，所以讓賀宗孔覺得若劉元卿願挨家挨戶傳講，肯定能讓陽明學在西鄉大復興，也肯定能夠收到移風易俗之效。劉元卿無言以對。有意思的是，賀宗孔死前仍不忘告誡子孫說：「家會、鄉會，所以講學修德，維持世風，吾雖死，其勿懈！」這也凸顯出，除了書院講學以外，地方上的家會、鄉會，才是讓學術能夠深入鄉里及百姓生活中的關鍵所在。⁹

江右與泰州之於小讀書人

大儒與小讀書人是互為表裏的。大儒風光登壇講道，所講的心性義理學說，晶瑩通澈，令人神往，而實際上讓這些這些學問流傳並深入到鄉、里、族之間，則須倚賴小讀書人之力，而小讀書人所面對的，很多是識字不多，或對心性義理之說沒有興趣的人，所以他們不能夠講那些高深玄遠之學，也不能像打啞謎一般讓人自行揣度或領悟，他們說話必須直截了當，直擊人心，又必須能夠與日常生活的情態相對照相呼應。大儒是光鮮亮麗的大人物，小讀書人則是實現這些光鮮亮麗的小卒子。

劉元卿是江右陽明學派大儒中少數的例外。《明儒學案》將劉元卿列入江右學案，但

其實他師從耿定向（1524-1596），而耿定向是泰州學派的一員。從鄒守益等大儒無法將其學說傳入西鄉，而劉元卿卻可以一人之力改變一鄉風氣，也讓我們看到泰州學派著名的「赤手搏龍蛇」的另一種樣貌。劉元卿沒有搏龍蛇，但他卻能夠把一些地方豪強（白話說就是今日的角頭）吸引到書院中，改易他們的心性，讓他們甚至主動作起移風易俗的事。

這也凸顯出江右與泰州的差異所在。江右陽明學派有賴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，大儒是談說者，小讀書人則是執行者。但若一鄉一地的文教不高，即使有小讀書人前往書院聆聽大儒的講學，但回到鄉里、家族以後，若未成立講會，學術便難以廣傳。也因此，嘉靖年間安福各鄉都有講會的時候，西鄉卻是寂無聲息，儼然是化外之地一樣。

劉元卿在西鄉的作為，則更接近泰州學派能夠深入到基層的那一面。作為大儒，並不只是應對小讀書人而已，還必須面對面應對鄉里豪強，所以不僅不能是文弱書生，還必須有極大的人格魅力，以口才以學問以人格以成聖的追求，來讓人欽服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越是文教不高的地區，泰州學派越容易展現其獨特風格。

或許正是這個緣故，讓劉元卿在安福這個大儒群集之地有一席之地。該縣列名《明儒學案》的大儒，有鄒守益父子孫三代5人、劉文敏、劉邦采（1492-1578）、劉陽（1525年舉人）、王時槐（1522-1605），加上劉元卿，共10人。其中，鄒守益最受當時人所尊崇，而從鄒守益的傳記可知，當他病危及死後，遠近士民，不分男女老幼皆痛哭失聲，儼然是把鄒守益當作像是父母，又像是儒家的聖人一樣。（圖5）鄒守益以外，則只有劉元卿被門人弟子視為聖人一樣的人物，為他在縣城建近聖館，入祀其中。¹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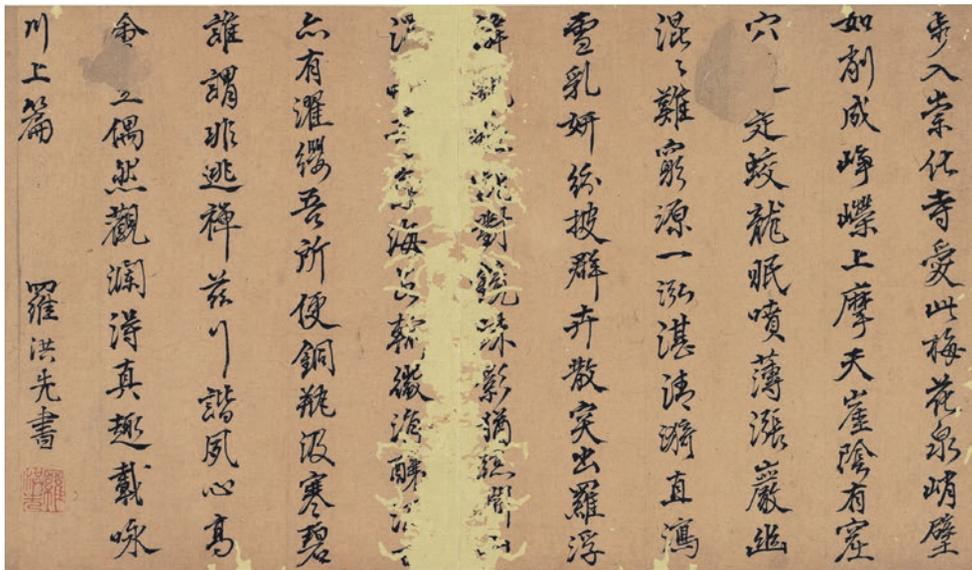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6 明 羅洪先 書五言詩 收入《明人詩札》第四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書 0004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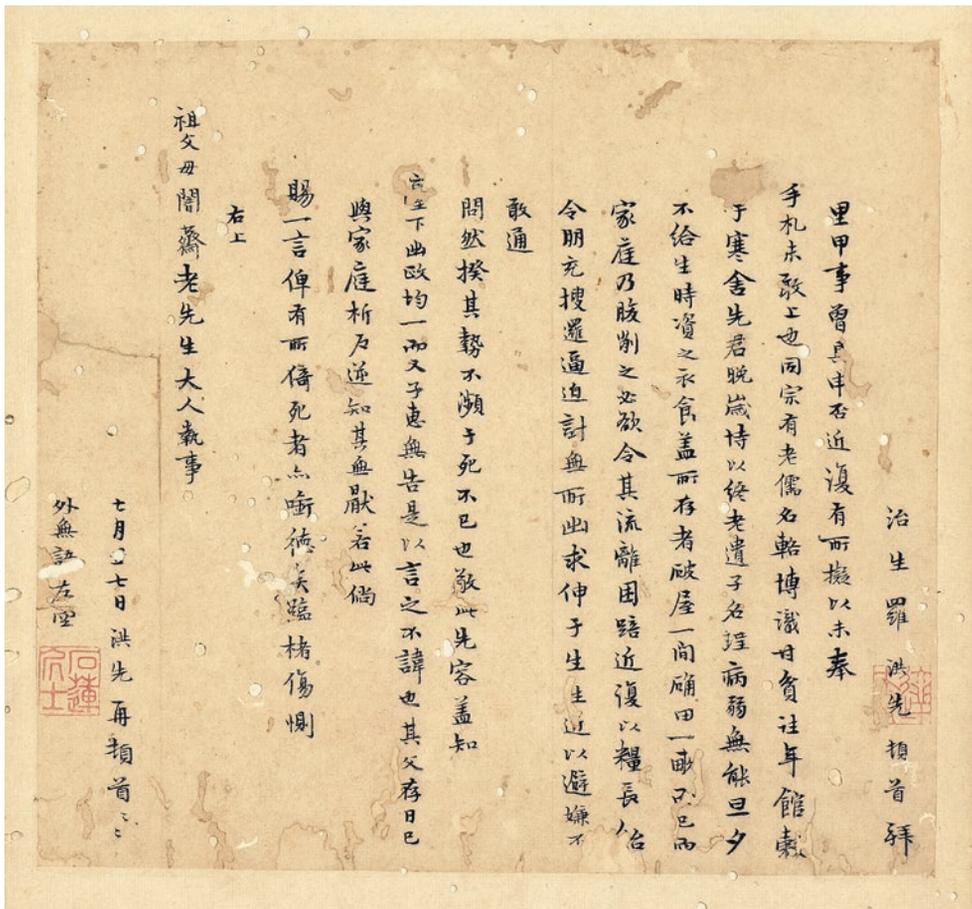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7 明 羅洪先 尺牘 收入《名人尺牘》第二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74

羅洪先為羅輅之子充糧長事而代向官方申訴。羅洪先之父與羅輅二人情誼甚篤，而羅輅善理學，與羅洪先的關係則在師友之間，羅洪先為師。羅輅的家族雖是寒族，卻得以與羅洪先的家族合族。逮及萬曆朝，羅輅的族孫羅大紘亦以理學聞名，遂矢志繼承羅洪先的志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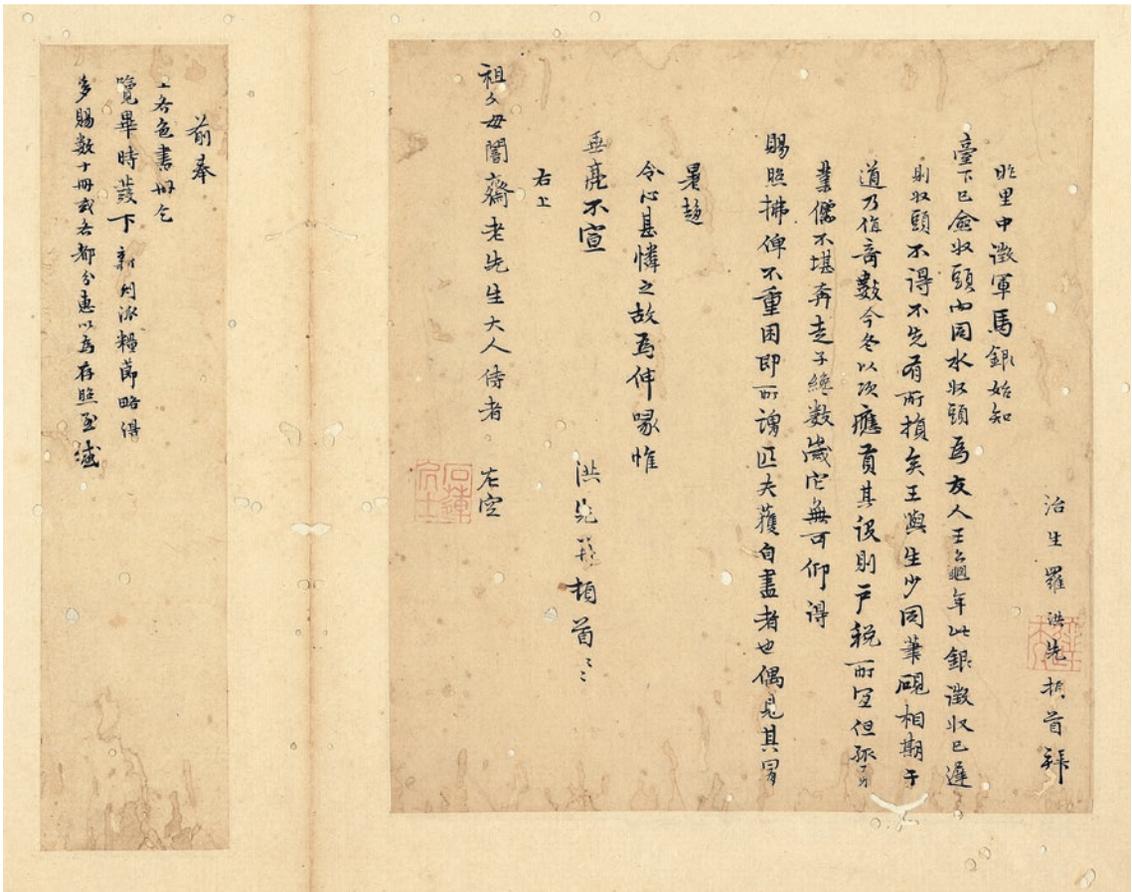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8 明 羅洪先 尺牘 收入《名人尺牘》第二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書 000374 羅洪先為門人王龜年及夫馬銀稅向官方申訴

沒有講會的陽明學

最後，我想談一個特別的特例，也就是沒有講會的陽明學。

過去很多研究都會把陽明學與講會直接連結在一起，而且認為陽明學就是靠講會而傳播，也因此，明中晚期兩次禁毀天下書院，便對陽明學講會造成傷害。這個認識當然是很初步而簡單的，中央政府禁毀天下書院，僅禁毀數十所而已，根據我們前文的討論便可知，書院是大儒的講學地，但陽明學深入鄉里間所靠的是小讀書人的講會，所以禁毀書院的作用，在其政策的宣示性、指標性，而不是實質的傷害。¹¹但禁毀仍凸

顯一事，就是這類在公共場合所作的講學活動，很容易引人側目，大儒的書院講學固然會引人關注，小讀書人的講會何嘗不是？也因此，我們看到萬曆中期以後，安福鄉里間越來越少見小讀書人成立講會，反而僅剩下少數書院的講學活動。我們固然不能直接斷言說這是政治力作用下的結果，但當小讀書人越來越少在鄉里間舉行講會，便幾乎預示了陽明學的中衰。

那麼，有沒有不需要講會的陽明學呢？有，而且非常令人驚訝的是，就在安福的鄰縣，同樣是陽明學的重鎮，有大儒羅洪先主持的吉水陽明學。（圖 6～9）



圖 9 羅洪先《念菴羅先生集》雕版 江西省吉水縣博物館藏 向靜攝



圖 10 鄒元標於天啓 4 年（1624）冬月為府獎善人晏佳期所題木匾「好善優世」
江西省吉水縣博物館藏 向靜攝



圖 11 鄒元標所題木匾局部 江西省吉水縣博物館藏 向靜攝

吉水不是完全沒有講會，但數量極少。羅洪先的石蓮洞是個人書屋，位於相對僻遠之地，我們在安福所見的書院或講會，往往是在容易聚集人群的地點，但羅洪先的選擇完全相反，他刻意選擇石蓮洞，簡直好像擔心人們過來一樣。也正是因為僻遠，當羅洪先在世時，人們

尚因慕羅洪先之名而前往，但在羅洪先去世以後，石蓮洞很快就荒廢而乏人問津了。

羅洪先主持下的吉水陽明學，跟安福陽明學的流傳比較起來，可謂是十分封閉，幾乎在以羅洪先為中心的人際關係網絡間流傳，所依靠的不是書院或講會，而是人與人的親友關係，

以及家族內部或家族間的血緣或姻親關係。因此我們若是仔細查察與羅洪先往來的一些人，不是與羅洪先同都里，就是在鄰近的都里，而且彼此往往有姻親關係。我們甚至可以簡化一點說：嘉靖年間的吉水陽明學，幾乎就是在羅洪先所在的 61 都內流傳的。¹² 值得注意的是，這類非常封閉的學術流傳，流傳的地域範圍極有限，但卻仍可能在家族內部下達到基層的人，如泥田周氏與曾氏的幾位商人，便得以與羅洪先結交，並得其撰文表彰。

羅洪先主持下的吉水陽明學，可謂是特例，所以在羅洪先去世以後，繼起的另一位大儒鄒元標，便回歸到書院講學的模式，而且不在 61 都所在的同水鄉，而是在縣城講學。（圖 10、11）

但鄒元標在縣城講學的同時，同水鄉仍保持其學術的傳承與活力，以致於直到清初吉水的代表人物李元鼎（1595-1670），仍是出自 61 都的谷平李氏。這也讓我們注意到，書院及鄉里講會，這個十六世紀陽明學所發展出來的新模式，讓學術在地域間廣泛流傳，在廣度上，觸及各地的小讀書人，而在深度上，則藉由講會而進入鄉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。但這個模式似乎在十七世紀遭遇困境，而無法再持續運作下去。相對的，同水鄉 61 都的家族傳承，以某地域間的幾個家族共同支持的學術，似乎更可能長久發展，而較不受外在情勢變化所干擾。這似乎也預示了後來清代家族學的興起。

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

註釋：

1. 余英時，《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4），頁 292-297。
 2. （清）歐陽劭平等纂修，《續脩安福縣志》（上海圖書館藏民國間影印清乾隆十五年刻本），《理學傳》，〈三溪公傳〉，頁 15-17。
 3. （明）曾同亨，《泉湖山房稿》（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影印），卷 26，〈贈行人司行人春園朱公墓誌銘〉，頁 10-11。
 4. 王宗舜事見（同治）《安福縣志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2014，據清同治七年（1868）刊本影印），卷 11，〈儒林〉，頁 18。王威事見同前書，卷 2，頁 24。
 5. （明）劉元卿，《劉聘君全集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，據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（1852）重刻本影印），集 154，卷 8，〈王箕峰公墓銘〉，頁 27-29。
 6. （明）劉元卿，《劉聘君全集》，卷 7，〈趙時卿傳〉，頁 58-60。
 7. （明）劉元卿，《劉聘君全集》，卷 8，〈一溪賀君行狀〉，頁 26-29。
 8. （明）劉孔當，《劉喜聞先生集》（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三十九年（1611）刊本影印），卷 4，〈雙潭公傳〉，頁 16-19。
 9. （明）劉元卿，《劉聘君全集》，卷 8，〈一溪賀君行狀〉，頁 26-29。
 10. （明）鄒德泳，〈劉正學私諡議〉，收入《南溪劉氏續修族譜》（上海圖書館藏清崇本堂木活字本），《徵翰記》，頁 7-8。
 11. 對禁毀書院的討論，請見張藝曦，〈明中期地方官員與王學學者的緊張——以白鷺洲書院興廢為例〉，《大陸雜誌》，104 卷 6 期（2002.6），頁 30-54。
 12. 詳細的討論，請見張藝曦，《社群、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：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、安福兩縣為例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，2007），第三章，〈吉水王學與家族〉。
-